

海外汉语 探索四百年管窥

西洋汉语研究国际研讨会暨
第二届中国语言学史研讨会论文集

○ 主编 姚小平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本书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二一一”建设项目 ○

海外汉语 探索四百年管窥

西洋汉语研究国际研讨会暨
第二届中国语言学史研讨会论文集

○主 编 姚小平

○副主编 谭慧颖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外汉语探索四百年管窥: 西洋汉语研究国际研讨会暨第二届中国语言学史研讨会论文集 / 姚小平主编. —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8.8
ISBN 978-7-5600-7780-2

I. 海… II. 姚… III. ①汉语—研究—文集 ②汉语—语言学史—文集
IV. H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34964 号

出 版 人: 于春迟

责任编辑: 李旭洁

装帧设计: 刘 冬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印 刷: 北京爱丽龙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6.25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0-7780-2

定 价: 38.90 元

* * *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出版社负责调换

制售盗版必究 举报查实奖励

版权保护办公室举报电话: (010)88817519

物料号: 177800001

努力开发早期西洋汉语研究的宝库

西洋汉语研究国际研讨会暨第二届中国语言学史研讨会 开幕式致词

尊敬的会议主持人姚小平先生，

尊敬的陈乃芳校长，

尊敬的沈家煊所长、侯精一主编、张国庆主任、陈维振院长，

尊敬的胡明扬先生、黄国营先生，

尊敬的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我谨代表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和《语言文字应用》杂志，祝贺“西洋汉语研究国际研讨会暨第二届中国语言学史研讨会”的召开。

西方的汉语研究可以分为早期与现代两个时期。早期西方的汉语研究，起码从明朝中后期开始到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利玛窦、金尼阁、瓦罗、马若瑟、雷慕沙、马礼逊、马士曼、艾约瑟、威妥玛、甲柏连孜、卫三畏、比丘林、叶合逊等一批西方的传教士和学人，对汉语及汉语方言进行了许多研究，形成了西方语言学史和中国语言学史上富有特色的一页。而现代西方的汉语研究，是建立在现代语言学基础之上、一直同汉语的现代研究交合共进的，并非直接导源于早期的西方汉语研究。一般所说的“西洋汉语研究”，多指早期的西方汉语研究。

早期西洋汉语研究，有许多都没有对中国的汉语研究发生直接影响，有些至今仍然埋在历史的烟尘中，多数中国学者对西土的汉语研究成果也并不熟悉。同时就今天的眼光来看，由于语言学在 20 世纪特别是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的飞速发展，当年的那些研究成果可能多数都难以融入今人的汉语研究，但并不因此而降低其学术史上的价值。

早期西洋的汉语研究，具有重要的文化史价值。是这些研究，

将汉文化由之而传向西方，同时利用汉语及其方言，也将西方的宗教教义及科技文化传到东方。因此，当年西洋的汉语研究，既是汉学的宝贵财富，同时也是人类文化的宝贵财富。

语言学工作者更感兴趣的是，早期西洋的汉语研究具有重要的语言学价值。其一，这些著述记录了当时的一些语言现象，或描述了当时语言的若干状况，这些宝贵的资料对于认识那一时期的汉语有相当重要的帮助。其二，这些研究者，由于西方语言的经验和当时西方语言学的训练，他们会发现以汉语为母语者所不易发现或者容易忽视的现象，会对一些语言现象作出有趣的解释。虽然当时的研究并不全面，甚至失于浅薄，但仍然会对今天的汉语研究有所启发。其三，他们的研究，对中国早期的语言研究和语言实践，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影响。比如，利玛窦对汉语罗马化拼音产生了巨大影响。《马氏文通》这一鸿篇巨制，很难说一点也没有受到当时这些研究的影响。

早期西洋的汉语研究成果，用多种语言记载，散存在不同的地方，材料搜集、整理有相当大的难度，必须有许多热心人共同努力，来开发这些文化学和语言学的宝藏。这次会议就是大家共同努力的一种表现，收获一定不会小。

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

李宇明

2003年9月13日

序 言

明末传教士陆续来华，西方科学文化也随西教一道输入中国。从此，中国人无论愿意与否，也无论被动主动，都很难再与世界隔绝。今日中国之开放，与西方频繁往还、互通有无，其初始而蹒跚的一步正是在明末迈出的。语言和语言学上也是如此。今天已融入汉语的大量西文词，国人语言生活中须臾不可离的汉语拼音、汉外字典，学界与坊间俱已熟稔的名、动、形、副等词类标签以及相应的语法分析，——所有这一切，全都肇始于四百年前。

以往四百年的中西语言文化交往，给中国带来的好处可谓巨矣！然而，中国并不只是纯受惠而不回赠的一方，西方从中国获取的好处也很多。明末西方语言文化与中国语言文化的邂逅，是强强相遇，其结果是互惠互利，而不是任一方单边受益。中国语言学要感谢西方，西方语言学也同样要感谢中国。假如中国语言文字未能西传，欧洲人不识汉语汉字，那么西方语言学就会缺少“孤立语”这一认识对象，于是就无法建立语言类型学，因此也就难以创建一门必须涵盖所有语言类型的普通语言学。在16、17世纪的西方学人眼里，汉语是一个非常另类的对象，另类到让他们又恨又爱——恨到极处，竟称它是魔鬼的语言，觉得世界上没有哪种语言比它更原始、更难学；爱到至深，则奉它为理想语言文字的范本，以为它最贴近思维，最合乎事物本性。假如汉语汉字未曾进入培根、达尔加诺、莱布尼茨等人的视野，他们对普遍语言文字的追求就会失却方向；假如未发现汉语汉字，近代西方语言思想史上就少了一个饶有兴味的话题。

不过，对于历史学，对于学术史的考察，作这类假设未必有多少意义。历史学不是实验科学。历史是业已发生的事实，其过程是绝对不可逆转的。影响历史进程的因素有必然、有偶然，就重大历史事件而言，必然性总是大于偶然性。传教士必定要来中国，因为基督教和西方文明本质上属于外向扩张型，不会像儒学那样满足于施教一国一邦；儒家即或曾有化行天下的念头，也是停留在理论上，绝少主动步出国门。况且，16世纪末赴华之前，传教士已经踏足美洲、印度、菲律宾、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登陆

中国只是时间早晚而已。既到中国，传教士必定会奋力学习这里的语言文字，因为他们不是一般的行商或旅人，借几句洋泾浜汉语就能应付交往；也不是临时遣派的使臣，依靠译员大抵可以传言达意。传教士肩负传播教义的使命，并且无论走到哪里都不能不以当地语言播教，所以他们来到中国，第一要务就是熟练掌握汉语。在接触和认识汉语的过程中，为了方便学习，传教士习惯用自己的文字来注音、拼读和转写，而西文恰是简便易行的记音手段，于是汉语就有了拉丁字母注音，有了音序排列和检索法。传教士热衷编撰课本、字典、语法书，这也是天主教会行教海外的语文学传统所使然，在世界各地他们都要这样做，很大程度上这是他们日常工作的一部分，虽然也不乏学术方面的动机和个人兴趣。面对汉语语法现象，由于中国人除了虚字实字、活字死字一类粗线条的分析之外，没有现成的描写框架可资利用，传教士们势必要运用自身语言的语法知识。这些语法知识的基础是逻辑，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自古就被认为是人类语言所共享的。但是，最早撰著汉语语法的西士，无论是谁，是耶稣会士卫匡国还是道明会士胡安·柯伯，都没有糊涂到以为欧语语法能够全盘适用于汉语。相反，从一开始传教士语法家就认识到了这样一点：汉语是一种没有形态变化、词类界限不严明、对语境要求极高的语言，把欧语语法的概念、范畴、规则移植于汉语，只不过是权宜之计。至于移植的结果，今天看来有些是成功的，有些并不成功，而无论成功与否，对于后来欧洲汉学和语言学界的汉语研究都是必要的铺垫和积累。

2003年9月13—14日，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语言研究所与本校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福建师范大学外语学院等单位合作，在外研社大厦举办了“西洋汉语研究国际研讨会”。莅临开幕式并致词抒感的校外学者有何九盈、胡明扬、陆俭明、沈家煊、侯精一、黄国营、李宇明、张国庆、陈维振等。值会议文集出版之际，谨向诸位先生和与会代表再申谢忱！只可惜唯有李宇明教授一人的发言尚存记录，可以为这部《海外汉语探索四百年管窥》增色。

因技术缘故，文集的出版略晚了几年，而在短短几年间，对海外汉语研究史的考察又有可观的进步。2003年研讨会的契机，是纪念西班牙道明会士瓦罗（万济国）梓行 *Arte de la Lengua*

Mandarina (广州 1703) 三百周年, 并适时推出汉译本《华语官话语法》(外研社 2003)。瓦罗此书向称世界首部正式出版的汉语语法, 目前我们仍可维持这一说法。不过, 有些研究者如西山美智江博士已经注意到, 若论成稿时间, 耶稣会士卫匡国用拉丁文撰著的 *Grammatica Sinica* (《中国文法》) 比瓦罗《官话语法》还要早三十年; 而根据已故意大利汉学家白佐良 (Giuliano Bertuccioli, 1923—2001) 的考证, 《中国文法》早在 1696 年就已出版, 只是其印本尚待发见, 其中的某个本子很有可能保存于东欧某座图书馆。就在撰写这篇序言之前, 我刚刚览毕白佐良先生的遗译《中国文法》。中译本的问世指日可待, 届时必将成为研究者瞩目的又一亮点。我们距离澄清海外汉语研究史的目标还很远, 然而每一篇文本的发掘, 每一条线索的考辨, 每一种关系的理清, 都能让我们向前推进一步。积跬步能至千里, 借管孔可窥全局, 本书编者不思高远, 但求进一小步。

姚小平

2007 年岁末于北外语言所

目 录

【综论与专史】

- 徐文堪 “汉学”与“虏学”之互动 / 1
- 徐光台 明末西方《范畴论》重要语词的传入与翻译
——从《天主实义》到《名理探》 / 10
- 张西平 西方人早期汉语学习史简述 / 47
- 武 波 汉语汉字与 17 世纪英国普遍语言运动 / 70
- 董海樱 17—18 世纪西方汉字观念的演变 / 94
- 董方峰 从马礼逊到马修斯
——近代史上的西方汉英词典编纂者及其作品 / 103
- 张 丹 汉字拉丁化注音的历程 / 127

【著作与人物】

- 林 璋 《华语官话语法》与 17 世纪的南京话 / 136
- 张美兰 《华语官话语法》及其语法问题偏误辨析 / 149
- 西山美智江 近代欧洲人撰写的汉语语法
——《华语官话语法》及其语言和语法特点 / 182
- 马又清
- 赵丽明 《华语官话语法》与早期传教士语言学 / 191
- 李 真 马若瑟对汉语语法研究的贡献 / 214
- 黄爱美 从马礼逊《通用汉言之法》
看英国早期来华传教士的汉语研究 / 232
- 于 苒 艾约瑟《官话口语语法》研究 / 245
- 张卫东 评威妥玛“汉语词的多功能性”之说 / 278
- 陈 怡 约翰·韦伯对汉语的接受 / 288
- 姚小平 阿德隆《语言大全》中有关汉语的论述 / 321
- 李 翔 约翰生《英语词典》中的若干中国词 / 333
- 盐山正纯 关于马礼逊的《神天圣书》
——对《新约·使徒行传》词汇的重点考察 / 350
- 王荣波 谈谈马礼逊的《五车韵府》 / 363

- 陶德民 卫三畏——从初学者到中英字典编撰者 / 370
- 顾卫星 试说《华英通用杂话·上卷》 / 388
- 吴迪 从“唐话”到“妇语”
——简析日本近代汉语教材《燕京妇语》 / 398
- 樊长荣 白保罗和沙加对汉藏语历史比较研究的
贡献 / 407

【方言与音韵】

- 游汝杰 西儒的汉语方言分类和分区研究 / 419
- 千叶谦悟 《西蜀方言》与一百年前的四川方言音系 / 432
- 谭慧颖 《西儒耳目资》“活图”探源 / 447
- 谢玄 朝鲜第一部韵书《东国正韵》对汉语音韵学研究的
价值 / 470

人名索引 / 486

【综论与专史】

“汉学”与“虏学”之互动

徐文堪

西方汉学从其发展初期起，就注意对中国境内边疆地区及跨境周边地区以至整个欧亚大陆（Eurasia）的研究，“汉学”与所谓“虏学”即突厥学、蒙古学、藏学、印度学、伊朗学、佛教学等存在互动关系。汉学研究中对边疆、四裔和中外关系、中外语言交流问题的探索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应该坚持不懈地进行下去。

傅斯年（1896—1950）在其名篇《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1928年）中有一段论述：

我们中国人多是不会解决史籍上的四裔问题的，丁谦君的诸史外国传考证，远不如沙万（Édouard Chavannes, 1865—1918）君之译外国传，玉连（Stanislas Julien, 1797—1873）之解大唐西域记，高几耶（Henri Cordier, 1849—1925）之注马可博罗游记，米勒（F. W. K. Müller, 1863—1930）之发读回纥文书，这都不是中国人现在已经办到的。凡中国人所忽略，如匈奴、鲜卑、突厥、回纥、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等问题，在欧洲人却施格外的注意。说句笑话，假如中国学是汉学，为此学者是汉学家，则西洋人治这些匈奴以来的问题岂不是虏学，治这学者岂不是虏学家吗？然而也许汉学之发达有些地方正要借重虏学呢！

与此文同时刊登的，还有傅斯年提议、筹备会员通过的《本所对于语言学工作之范围及旨趣》，其中列举了几项主要的研究课题：一、汉语方言；二、西南语；三、中央亚细亚语；四、语言学。在谈到“西南语”研究的目标时，作者认为：

我们中国人因为自己的母语在这一族里，所以天性上，或应云心理上，了解这些语言的本领比欧洲人大。若果印度支那语系的一行学问也被欧洲人占了先去，乃真是中国人的绝大耻辱啊！我们现在要一个一个的研究这些语言，将来要综合起来建设印度支那语系的学问。

在论述广义的中亚语言研究的重要性时，作者列举了梵语、巴利语、粟特语、吐火罗语和突厥语、蒙古语、满语等，强调“这些语言，特别是梵语，和中国史学中若干最重的科目之关系用不着详说”；“我们若不和法德人比着这些知识，怎么可以识大宛而辩大夏，考于阗而迹疏勒！”

另据吉川幸次郎（1904—1980）的回忆，1927年4月间，胡适（1891—1962）在京都支那学会演讲时，曾于黑板上大书“虏学”二字，可见在这一问题上，胡、傅两先生的见解是一致的。

正如七十多年后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陈庆隆在《释“虏学”》中所说：“‘虏学’之名，并未广泛使用。尽管如此，在当年极其保守的学术界里，傅先生勇于挑战传统，擅于规划未来，率先提倡‘虏学’研究，颇具前瞻性。”（2000：109—124）这篇文章着重回顾了国外阿尔泰学特别是突厥学的发展历程，并以实例说明这些学术成果对近世中国学术界的影响，如陈寅恪（1890—1969）的治学就终身与“虏学”密不可分，诚如其亲戚俞大维所回忆：

他研究中西一般关系，尤其文化交流、佛学的传播及中亚的史地，他深受西洋学者的影响。例如法国的 Pelliot（1878—1945）、德国的 F. W. K. Müller、俄国的 W. Barthold（1869—1930）及其他国学者。

陈庆隆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致陈垣（1880—1971）的一封信中，就特别提到巴托尔德的名著 *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1928 年英文版），足见俞氏之说不误。至于伯希和等法国汉学家的著作，通过冯承钧（1887—1946）翻译，在中国学术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至今仍是受到普遍重视的宝贵资料。缪勒曾任柏林民俗学博物馆馆长，据说他通晓从大西洋到太平洋地区的所有主

要语文，具有很高的学术地位，故为陈氏所景仰。

当然，所谓“虏学”，只是一种比喻的说法。西方汉学从其发展初期起，就十分注意对中国境内边疆地区及跨境周边地区以至整个欧亚大陆（Eurasia）的研究，取得的成绩十分显著，且一度成为汉学研究的主流。如对汉藏语的研究，如果从雷登（J. C. Leyden）的著作 *On the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of the Indo-Chinese Nations*（*Asiatic Researches* X, 1808: 158—289）算起，至今已有200年了。至于“汉藏语”这个名称，则是普勒胥鲁斯基（Jean Przyluski, 1885—1944）在1924年提出的，英文文献中首见于1931年（*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VI, 3: 667—668）。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 1862—1943）、伯希和、勒柯克（Albert August von Le Coq, 1860—1930）、大谷光瑞（1876—1948）等对敦煌、吐鲁番文献的劫掠，尽人皆知，同时却也促进了汉学、藏学、印度学、伊朗学、突厥学的发展。我们可以列出一大批19—20世纪以及当代西方汉学家的名字，如：

比丘林（Nikita Yakovlevich Bichurin, 1777—1853）、克拉普罗特（Julius Heinrich Klaproth, 1783—1835）、雷慕沙（Jean-Pierre Abel Rémusat, 1788—1832）、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 1815—1889）、肖特（Wilhelm Schott, 1826—1889）、甲柏连孜（Hans Georg Conon von der Gabelentz, 1840—1893）、布润珠（Emil Vasilievich Bretschneider, 1833—1901）、夏德（Friedrich Hirth, 1845—1927）、柔克义（W. Woodvil Rockhill, 1854—1914）、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 1889—1978）、李华德（Walter Liebenthal, 1886—1982）、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 1894—1979）、李约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韩百诗（Louis Hambis, 1906—1978）、葛玛丽（A. von Gabain, 1901—1993）、艾伯华（Wolfram Eberhard, 1909—1989）、卜弼德（Peter Boodberg, 1903—1972）、石泰安（Rolf Alfred Stein, 1911—1999）、狄庸（Jan Willem de Jong, 1921—2000）等等。

这些学者的研究领域都并不仅仅局限于汉学，有不少还是卓越的突厥学家、蒙古学家、藏学家、印度学家和佛学家。从这一点就足以看出汉学、东方学与亚洲研究其他领域的密切互动关系。

近代受到西方学者影响的日本东洋学界，百年以来也是名

家辈出，不能不提一下。这里大略举出一些我国学者熟悉的名字：白鸟库吉（1865—1942）、内藤湖南（1866—1934）、鸟居龙藏（1870—1951）、桑原鹭藏（1871—1931）、滨田耕作（1881—1938）、羽田亨（1882—1955）、石田干之助（1891—1974）、木夏一雄（1913—1991）、本田实信（1923—）、山口瑞凤（1926—）等等。

还有些学者本人不是汉学家，但其工作对汉学研究有重要贡献，如玉尔（Henry Yule，1820—1889）、马尔卡（Josef Marquart，1864—1930）、巴利（Harold W. Bailey，1899—1996）、克劳森（Gerard Clauson，1891—1974）等，人数也不少。最著名的例子是印度学家钢和泰（1877—1937）。早在1923年，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创刊号就发表了他的《音译梵书与中国古音》。这篇文章在中国历史语言学的发展史上有深远影响。该文认为，研究汉语音韵的材料有三个重要的来源：一是汉语方言，二是汉外对音与译音，三是反切与韵表。其中汉外对音与译音尤以梵汉对音最为重要，“梵咒的音读因为有宗教的性质，故在中国古音学上的价值比一切非宗教的译音格外重要”。反映胡适观点的《国学季刊》发刊词还明确地指出：“在音韵学上，比较的研究最有功效。”这说明了当时中国学者对语言学中的历史比较法的认同。

季羨林（1911—）在《留德十年》中曾提到20世纪30年代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的汉学家赫芬（Otto von Maenchen-Helfen，1894—1969），其中有一段生动的记述：

他正在研究明朝的制漆工艺。有一天，他拿着一部本所的藏书，让我帮他翻译几段。我忘记了书名，只记得纸张印刷都异常古老，白色的宣纸已经变成了淡黄色，说不定就是明版书。我对制漆工艺毫无通解，勉强帮他翻译了一点，自己也不甚了了。但他却连连点头。他因为钻研已久，精于此道，所以一看就明白了。

此公曾信奉马克思主义，是一位通晓多种语言的中亚学学者，对考古学和艺术史也造诣甚深。1969年他在美国去世，四年后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遗著 *The World of the Huns*（1973），这本关于古代匈奴人的著作使他蜚声世界。汉学家赫芬

的著作早就引起了我国学者的注意，如 20 世纪后半期海外交通、贸易及华侨史研究者韩振华（1921—1993）曾翻译了他所撰的《丁零民族考》（韩振华 2003：321—328），刊载于《广东日报·民族学刊》第 17 期，时为 1948 年 7 月。

外国汉学家的工作对中国学者的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也产生了影响。比利时神父贺登崧（N. A. Grootaers, 1911—1999）是汉语方言地理学的先驱，他的学生兼合作者王辅世（1919—）却转而研究苗语等语言，取得了显著成就。王辅世于 1950 年在辅仁大学完成硕士论文《宣化方言地图》，1994 年该文由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研究所正式出版。为了进一步说明两者的互动关系，下面再举一位 19 世纪在英国工作的法国汉学家拉古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 1845—1894）的例子，从中可以看出我们应该正确对待早期将汉学和非汉学研究结合时产生的谬误。

拉氏短暂的一生，留下了不少著作。他曾受聘编著大英博物馆所藏的中国古钱目录，还翻译过《易经》。另外，他还撰写了《中国太古文明西源论》（*Western Origins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 from 2300 B. C. to 200 A. D.*），这部书曾引起很大争议。此书引据西亚古史，多方附会，论证中国民族源自西方，认为黄帝率领着他的人民从巴比伦和埃兰（Elam）迁移到中国的西北，然后进入黄河流域。这种说法自然不能成立，法国著名汉学家马伯乐（Henri Maspero, 1883—1945）曾给予中肯的批判。但自从日人白河次郎等人撰书（1899）援斯说立论以来，晚清学者如章太炎、蒋智由、刘师培、梁启超、黄节等率相考稽古史，多方比附，对此说深信不疑。从学术上说，这是由于我国学术界当时对西亚古代历史、文明以及语言所知甚少导致的。论者或以为拉氏这套论说蕴含着种族偏见和不实之词，是伴随西方殖民帝国主义的扩张所产生的“欧洲中心论”的霸权文化表现。其实，作者本身可能并没有什么政治意图。值得注意的是，拉氏在 1885—1886 年出版了《汉人居住之前的中国语言》（*The Languages of China Before the Pre-Chinese Races of China Proper Previously to the Chinese Occupation, Transaction of the Philological Society, London*），这本书是探索史前中国语言状况的开创之作。

李济(1896—1979)于1923年在哈佛大学研究院完成博士学位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The Formation for the Chinese People*, 1928年出版)。书中对拉氏有如下评论:

在没有任何现成的体质人类学资料的情况下,语言学的分类成了划分这些部落的唯一依据。然而,遗憾的是,即使使用语言学分类法也很难作出任何最终的结论。拉古伯里所写下的先驱之作,迄今后继乏人。拉氏的著作在许多方面不够准确,他时常把许多明明是汉语的词汇读作土著语言。……

此外,对汉语古音的构拟至今仍不完善,加以汉语书面语的语法结构作为语言研究的基础又容易误入歧途。拉氏的著作完全基于历史文献,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他对原文的理解是如实的,其研究成果也必然是不准确和不全面的。戴维斯(Major H. R. Davis)的近作《云南》(剑桥大学出版社1909年版),在这方面有了长足进步。其中的一条是,他的材料完全来自于实地调查。除了观测上的个人误差之外,他的分类比较令人满意,尽管从整个体系上看还是没有脱出拉古伯里的窠臼。(1996译本:290)

李氏的书完成于上个世纪20年代,自然有其局限性。但作者根据汉文历史记载,结合生物学特别是遗传学的理论,运用语言学资料,论证中国历来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族的交往和通婚以及汉族“滚雪球式”的壮大,都是无可辩驳的事实。拉氏作品的贡献,在于初步阐明古代中国是一个多民族杂居共处的地区,在远古和上古时期,语言交流融合的情况错综复杂,以华夏语为核心逐步形成的汉语容纳了不同民族语言的成分,实际上是一个混合体。当然,拉氏认为原始的中国人是泰族,以为汤放桀的“南巢”就是唐代南诏的前身、泰族最初的根据地,这是没有根据的推测。

此外,拉氏也是西方第一篇讨论纳西族象形文字和东巴经的文章的作者。巴黎外方传教会教士德格定(Auguste Desgodins)1855年来华,1913年逝世,在西康传教58年,编有《藏法字典》,并把一本纳西东巴经复制本带回西方。拉氏在1885年发表的《西藏境内及周围的文字起源》一文中公开发表了这份材料,明确指

出这是纳西人的象形文手稿。又据美国的印度河谷哈拉巴文字研究者伐默(Steve Farmer)最近考证,拉氏在克宁汉首次公布哈拉巴文字印章后(见 *Report for the Year 1872-3 of the Archaeological Surrey of India*, 1875),于1882年在《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杂志》(*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New Series Vol. 14)上撰文,将这种文字与巴伯(Colborne Baber)带来的罗罗文(彝文)手稿作对比,认为这两种文字存在联系。这个尝试自然是失败的,但从中可以看出拉氏非常敏于发现新材料,他大概是世界上第一个关注印度河谷古文字的汉学家。

耶鲁大学人类学家马道克(George Peter Mardock, 1897—?)曾经说过:“在历史学或人类学上,是否有一种单一的文化,在其组成要素中至少有百分之九十不能归之于文化转借,那是令人怀疑的。”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承认文化传播的存在,而在于在研究这种现象时必须采取审慎的态度,把经不起推敲的臆测和争论减到最低程度(王赓武 2002: 23—40)。

正如考古学家苏秉琦(1909—1997)在其《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所指出的,中国历史传统就是天下国,有“中央”和“四裔”,既有中外之分,又有“天下一家”的理念。中国文化既是土生土长的,也是在与周边民族文化交流中发展起来的。最迟从旧石器时代晚期起,欧亚大陆以至新旧大陆之间就有了交流。中国东半部的史前文化则与东亚、东南亚乃至环太平洋的文化圈都有广泛联系。然而我国学者一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史记·匈奴传》中记载说,中国北方一带自古以来就生活着和汉代匈奴一样的游牧人。实际上,对中国北方地带游牧部落的出现,要从欧亚大陆游牧文化形成这一历史大背景来考察和认识(林沄 2003: 79—85)。在国外,近年由于“中国中心观”(Sinocentrism)的影响,汉学研究中已削弱了对边疆、四裔以及中外关系、中外语言交流等问题的探索,特别是对历史上的这些问题,已很少作为热点来研究了。

① 法国华裔学者吴其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对西域语言和宗教均有深入研究,其论述涉及藏文、西夏文、回鹘文、梵文、粟特文、叙利亚文、希伯来文等古文献,近年著作有《景教三威蒙度赞》(《史语所集刊》, LDII, 第3分, 台北, 1986)、*“Legend in the Old Testament and in the Huainanzi on the stopping of the solar movement”* (*Silk Road Studies* V, Turnhout, Brepols, 2001)等。